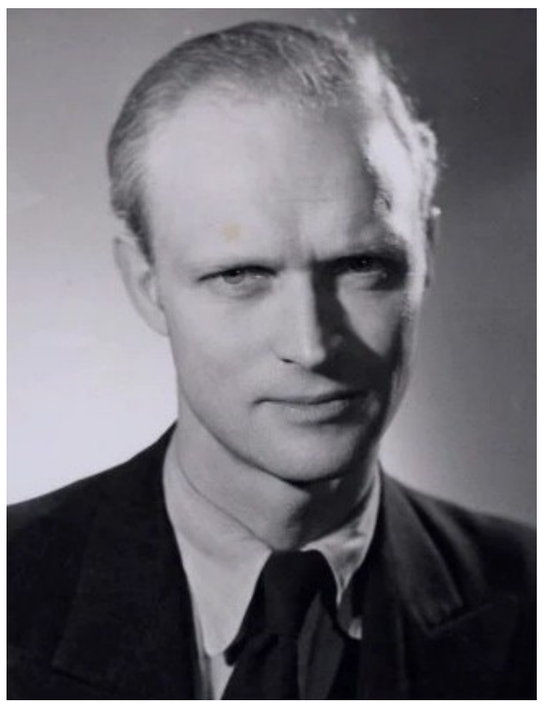
英国《新写作》丛刊：

联结中英反法西斯的“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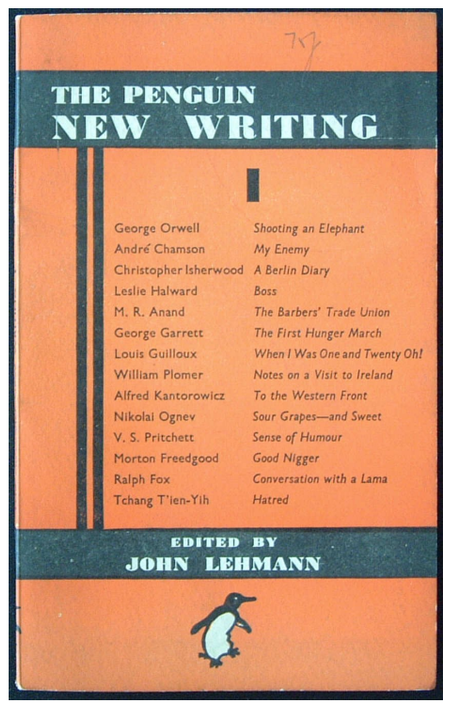
□傅 娆

上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作为抗战的重要文化力量，曾引起海外汉学家的高度关注，如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伊罗生、王际真等人，较早地进行了翻译出版的尝试，这些先行者不仅提振了各国抵御法西斯势力的信心，还刷新了西方对“腐朽没落的中国帝国之印象”。其中，英国著名编辑、出版家兼诗人约翰·莱曼的贡献不容忽视。

莱曼是现代主义文学团体“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成员，他于1931年在剑桥好友朱利安·贝尔、乔治·赖兰兹的介绍下，来到伍尔夫夫妇的霍加斯出版社工作，与现代主义、左翼文化圈名人交往甚密，是英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主编的《新写作》丛刊作为“二战”期间持有反法西斯立场的文学刊物，不仅广泛采纳世界各地的战争文学作品，为反法西斯阵营提供文学据点，同时具有极强的社会传播效应，其子刊《企鹅新写作》战时销量之高，巅峰时期一期能卖出十万册，是同期竞争者《地平线》的十倍之多。值得关注的是，莱曼将视线投向战火纷飞的中国，在丛刊上刊载了张天翼、叶君健、姚雪垠、阿垅、白平阶等作家的抗战小说，向西方呈现了中国觉醒的、追求现代化的面相。



《新写作》丛刊主编约翰·莱曼



《企鹅新写作》封面

对战争中的中国抱有深切同情

虽然莱曼终生没有踏足中国，但是他一直关注着中国革命与文学。“伊顿公学、剑桥大学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相继成为《新写作》萌芽的土壤。”前两者为莱曼提供了自由主义的氛围，而后者则驱使他朝着社会主义者转变。他深受“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反帝反殖思想，以及《左派评论》《新政治家》立场的影响，坚信“社会不公正、经济危机和掠夺殖民地的战争只有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消除”，对战争中的中国抱有深切的同情。另外，莱曼与欧美左翼知识分子斯诺夫妇、朱利安·贝尔、W.H.奥登与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等保持密切交往，通过他们获得了中国抗战的一手消息，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彼时中国作为东方古国从封建帝制向现代国家转型，引发了一系列激荡与剧变，吸引了西方的目光。或出于个人志向，或受命于出版业，这些有识之士纷纷访华，怀着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好奇和憧憬，向世界呈现了一个“活着的中国”的形象。长久以来目睹欧洲的分裂、战争的恐怖，莱曼十分渴求建立“人民统一战线”，中国同仇敌忾抵御日本法西斯的情景无疑对他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早在创刊之际，莱曼就十分欢迎“代表殖民地和外国作家的作品”，在意识到中国抗战文艺与《新写作》丛刊的定位相契合后，他开始着手建设丛刊的“中国版块”。尽管在剑桥时期受到过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但是第一次接触中国抗战小说比较巧合，他在一本法国杂志上发掘了张天翼的《仇恨》，将之刊载在《新写作》的第一期上。接着，他采纳了斯诺夫妇推荐的中国左翼小说，又与中国作家叶君健、萧乾取得直接联系。此时《新写作》丛刊已经与纽约的《小说》、莫斯科的《国际文学》齐名，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学刊物，对叶、萧二人而言，莱曼提供了向世界宣传中国抗战事业的机会。也正是从他们这里，刊物获得了可观的中国文学资源。

展现抗战中国的多重面相

《新写作》丛刊秉持着坚定的现实主义立场，其入选的中国小说描绘了中国普通百姓、知识分子、官僚阶层真实的生存状况，由此展现了中国社会的不同侧面。丛刊首先反映了思想觉醒、英勇斗争的中国形象。在此之前，英国读者已经从斯诺、史沫特莱的一系列报道中感受到了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精神面貌，富有中国特色的“游击战”牢牢吸引了西方的视线，这种作战方式灵活机动而又深入群众，对抵御法西斯侵略具有重要作用。姚雪垠、阿垅的小说聚焦游击队战士的成长。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中，庄稼汉王哑巴在进入革命队伍后，他的小农意识与军队的集体意识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在一次侦察行动中，他顺走了老百姓家里的一根牛绳，受到了同志的严厉教育，这才明白革命中个人利益要让位于集体利益。阿垅的《三流枪手》里的贫农老李一步步实现了革命主体的成长，初来乍到时，他十分不适应游击队的射击训练，在实战中也频频失手，遭受了战友们的嘲笑，为此他日复一日地练习枪法，最终变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思想的转变带来行动上的变化，“无知无识”的普通老百姓被革命感召，为自身和民族的解放展开了英勇斗争。

战争小说往往比较严肃，为了冲淡这类文学作品带来的紧张感，莱曼特意挑选了一些黑色幽默小说，在批判社会现实的同时博读者一笑，如V.S.普里切特、格雷厄姆·格林的讽刺小说都正中他下怀。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也是如此，小说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讽刺了“华威先生”之流，他们是战争中自诩为人民服务，却不做实事，破坏人民利益的官僚，这个形象已经成为了官僚主义的象征性符号，被译为多种语言在国外流行。白平阶的《沿着滇缅公路》的讽刺则超出了文本，与现实产生强烈的“互文”关系。滇缅公路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络的交通要道，在二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日本法西斯的施压下，英国政府于1940年关闭了公路缅甸段的通行，严重打击了正在坚持抗战的中国军民。小说围绕修建滇缅公路的工人和他们的上级之间的矛盾展开，好在官员明察秋毫、体恤群众，宣布卸任指导员的职务，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文本内外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中国人民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依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渡难关；英国政府却为了一己私利实施绥靖政策，以邻为壑。仅仅相隔一年，该小说就发表在了刊物上。

还有作品折射出对战争及战后社会转型的深思。莱曼第一次阅读张天翼的《仇恨》时，惊叹于它“比任何直接的宣传更能有效地传达其隐含的教训”，即“被压迫的受害者之间诞生的兄弟情谊”。小说中流离失所的乡民们将兵油子视为罪魁祸首，欲杀之而后快，但是与三位受伤的士兵发生交集后，才发现士兵不过是战争的执行者，罪恶的根源另有其人。叶君健的《梦》发表在1946年的《新写作》上，故事隐含着超越战争语境的社会思考。小说结尾，老汉抵不住战争的压力，将大女儿兰妞卖给了地主老爷，小女儿春妞只能通过幻想麻痹自己的心灵，她想象自己学会了读书写字，还为姐姐编织了一个“与大学生结婚”的美好结局。此岸是封建社会残余的婚姻制度，彼岸是新社会自由平等的生活，如何自渡？需要叙事者“我”的抗争决心，也需要春妞心心念念的文化教育的牵引。

跨文化的传播意义

《新写作》丛刊的中国叙事具有跨文化的传播意义。它们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故事，也不是为了满足西方对“异国情调”“古香古色”的猎奇心理而设计的，相反，这些故事传递了人类共同的情感、价值与观念。如，中国在战争中团结一心、共同御敌的场景与英国抵御法西斯别无二致，中国人民遭遇的苦难与压迫也是西方人民正在经历的现实，中西方都对战后社会的未来抱有困惑和希冀。《新写作》丛刊最初拟定的标题为“桥梁”（Bridge）正有此意，它以中国文学为沟通的桥梁，唤起英国的共鸣与同情，激发民众团结起来反抗法西斯的斗志与决心，由此发挥杂志“汇集我们自己阶级的作家和工人阶级的作家、我们自己国家的作家和国外作家”的联结作用。

它的成功固然离不开莱曼等左翼知识分子，也与中国抗战期间“文章出国”的举措息息相关。叶君健最初与在武汉大学任教的贝尔结识，在后者的推荐下将《王德胜从军记》发表在《新写作》第一期上，后来他投身于中国抗战事业，与岭南大学的唐纳德·艾伦共同翻译抗战小说。萧乾作为《大公报》驻英特派员，与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关系甚笃，二人为莱曼译介、润色中国小说。随着中国抗战形势愈发严峻，寻求反法西斯盟友的心情愈发迫切，需要“主动宣传中国自己的文学观和抗战”，“文协”的抗战宣传工作化被动为主动，于1939年创办了英文机关刊物，通过翻译作品塑造民族形象，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同频共振。可见，莱曼与中国抗战文艺的邂逅并非偶然，而是双方积极寻找精神盟友、凝聚抗战共识的必然结果。

因此，《新写作》丛刊可以视为中英文化交流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英国知识界长期秉持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心态，强调中国神秘、宁静、和谐的东方文明古国形象。直至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率先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大洋彼岸的大不列颠还沉浸在帝国主义的幻梦之中，陶醉于古典中国的乌托邦氛围里。莱曼的创举打破了这一局面，他关注“新中国”而非“旧中国”，“活着的中国”而非“死去的中国”，他将现代中国置于世界政治变局的现场做同步报道，见证和推动着中国从现代性语境的边缘位置走向对话的中心，从沉默的对象性存在转变为发出自己声音的主体。立足今日，世界局部战争不断，对和平的吁求强烈，《新写作》丛刊的跨文化案例经历百年时光，对当下的国际传播秩序重构、国家形象塑造与国家软实力建设，依然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值得学界进一步探析。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视 点

全球南方视角下重绘公平正义的世界文学图景

□李春光 余静远

自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概念兴起以来，其视角选择与概念界定的局限性引发了学术界的持续争论。秉持着公平正义的理念，文学创作者和理论家们积极构建起一系列文学共同体，如“革命文学”“弱小民族文学”和“三大洲文学”，旨在将被边缘化和忽视的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文学带回世界文学的中心舞台。这实质上是对“文学世界共和国”中普遍存在的等级化和不平等现象的有力抗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在“三个世界”理论和不结盟运动的感召下，亚非作家协会、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以及南方委员会等全球南方国家及地区的文学组织和社会团体应运而生。它们致力于推动大众文艺创作、增进民族团结与深化多边合作，并在此过程中发出了对不合理国际秩序的文化批判，引发了全球左翼作家群体的集体反思。然而，在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下，西方主流文学创作虽开始关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第三世界”文学创作在井喷式发展中显现出的同质化倾向。猎奇的描写、单一的苦难叙述及弥漫的悲观主义，使得经济欠发达的“全球南方”在文学作品中常被描绘成一个充满魔幻、死亡与创伤的割裂社会，进而构建出世界文学中孤独与绝望的南方形象。这种描绘并未真正实现公平正义，反而可能加剧了刻板印象。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南方的集体崛起，多元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极大推动了南方国家和地区在文学创作中对自我理论、视角和经验的主体性重塑，逐步形成了一个跨越地域、语言和种族的人文共同体。全球南方在追求公平与正义的文化论战中，试图重构世界文学版图，以便更好地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奠定跨越语言、文化和种族边界的人文主义基础。因此，深入回顾和展望全球南方文学的发展脉络，对于重绘公平与正义的世界文学图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万隆会议精神的感召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在政治独立的基础上联合自强。它们高举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旗帜，构建了以亚非作家协会和亚非作家会议为核心的跨国文学互动机制。这些机制不仅锻造了珍贵的跨国情感纽带，更通过互译计划、联合奖项、期刊集群等项目，为“第三世界”国家开辟了重要的对话空间，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思想文化交流的关键阵地。

文学创作逐渐成为亚非拉作家们思想碰撞与团结协作的平台。在塔什干、开罗、贝鲁特、罗安达、突尼斯等地召开的一系列亚非作家会议，不仅打破了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思想桎梏，更成为提升文化主权意识的重要契机。相较于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经典文学塑造，像《莲花》等多语种期刊及同名奖项所展现的作家与作品，构筑了抵御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渗透及文学自由议会等机构影响的重要阵地。这些交流机制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思想、情感与理念沟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尽管冷战结束与苏联解体使亚非拉的文学联合运动在形式上逐渐淡化，但亚非拉人民之间的思想交流与文学呼应从未中断。这种深层联系推动了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的人文交流持续演进。全球南方文学在继承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精神的同时，通过多元媒介与现实主义书写，拓展了公平正义的世界文学建构，为跨越语言、文化、种族的人文共同体提供了思想基石。

近年来，面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与极化政治等全球挑战，全球南方文学通过理论创新、话语重塑与经典创作，持续关注那些被西方中心主义边缘化的文学表达。全球南方国家以集体化的文学姿态，不仅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人文主义反思，更助力受压迫者摆脱历史的“百年孤独”，为构建公正合理的世界文学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重要力量。

全球南方文学的互动发展

进入21世纪，全球南方作家在相互砥砺的文学创作中，逐步摆脱了长期以来的边缘化地位。他们立足于本土经验，同时兼具全球视野，通过理论构建，有力地打破了西方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与叙事垄断。基于全球南方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一个跨国家、跨学科、跨区域的人文思想纽带正逐渐形成。诸如“反霸权全球化”“草根全球化”“下源全球化”以及“微型跨国主义”等理论的兴起，持续挑战着传统的中心-边缘思维模式，推动着全球南方国家在文学创作中重塑公平正义的世界文学体系与人文书写。

在去殖民化思潮的引领下，全球南方文学以纠正历史不公、反对文化霸权、反思殖民创伤为核心，形成了其鲜明的创作底色。面对充斥着白人至上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及“现代性”经验的文学叙事，当前全球人文主义的精神危机迫切需要如法农所倡导的“人民群众的文艺观”。在全球南方人文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人文金砖”等文化平台为文学创作注入了新活力。无论是“新时代·新经验·新想象”金砖国家文学论坛，还是“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等活动，这些机制都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南方在理论、视角与经验上的创新。多语言、多层次、多国别的青年、女性及网络作家的广泛参与，不仅彰显了全球南方文学叙事的独特魅力，更助力和平、团结、正义的文学价值传播，促进全球人文交流向着更公平合理的方向迈进。

面对当前部分国家将国际教育、人员流动、科技合作政治化与武器化的现实，全球南方人文共同体正通过集体化的人文主义书写，致力于消弭地缘冲突、对抗加剧及保护主义所带来的精神缺失。近年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全球南方国家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精神及不结盟运动时，重申了对全球和平、发展、安全的集体倡议。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通过构建平等的翻译、传播与阐释共同体，批判世界文学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优先主义及排他性议题，并积极采用全球视野与比较方法，共同塑造多元、复语、复数的文学审美。

凝聚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与话语体系，惯于将全球南方国家及地区的文学“异域化”“他者化”，割裂其历史与现实语境，从而扭曲了其文学创作的原貌。展望未来，全球南方文学的构建，不仅旨在弥合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审美差异，更将通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多语种文学的桥梁，主动消解世界文学中的文化断裂，打破片面化、异质化的审美偏见，最终勾勒出“全球化”与“本土化”共生共融的世界文学图景。相较于被动等待“被发现”的文学定位，全球南方文学在互学互鉴中展现出强大的主体行动力。

有别于殖民时期的文化控制与资本主义驱动的文学生产模式，全球南方作家正通过互为参照的创作实践与人文主义共同体的构建，积极重塑文化权力。他们逐步破解了文化失衡、文学认可缺失及文明互鉴平台匮乏的困境。针对剥削、暴力、霸权与压迫的深刻书写，不仅与泛非主义、泛阿拉伯主义、亚洲价值观等思想形成强烈共鸣，更通过摆脱被定义、被塑造的知识体系与集体认知，追求在网络时代跨国文学、艺术与美学的共同精神空间。这种多元主体的公平正义叙事，有力地打破了西方主导的单一化、霸权化文学话语。

独立自主、公平正义的全球南方文学创作，承袭了三大洲人民在政治去殖民化进程中的抗争底色。在当今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宏大背景下，这种创作进一步凝聚为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指引下，全球南方文学以其共同的思想、理念与人文关怀，从心理、情感与认知层面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从而重塑一个更具公平正义精神的世界文学格局。

（李春光系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教师，余静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辑）